

小巷管家团“组团作战”,小院议事厅“协商共治”,在北京市东城区,越来越多的居民走出家门,共同参与到社区自治管理之中,共同创造——

胡同里的幸福

阅读提示

在民政部公布的全国县级以上行政区划代码表上,北京市东城区代码为“110101”,位列首位。该区位于北京市中心,属于首都功能核心区,41.84平方公里

本报记者 赵昂

这里有光鲜亮丽的商厦,王府井大街历久弥新;这里也是北京市文物古迹最为集中的区域,连片胡同青砖绿瓦,紫禁夕晖掩映其中;作为城市建成区,这里还有老旧小区400余个,楼栋总数超过1200栋。

近日,北京电视台播出了10集纪录片,讲述北京市东城区如何用“绣花功夫”做好城市精细化管理,不断提升城市治理水平,探索具有北京风范的社区居民自治管理模式,建设和谐宜居的首善之区,纪录片的名字就叫《胡同里的幸福》。

归属感和认同感

“这是19号楼北侧,停车位的铁板翘起来了。”北京市东城区龙潭街道光明社区小巷管家宋雅军,在社区巡访时发现问题,连忙联系停车管理员。今年62岁的她,是龙潭街道最早的一批小巷管家。2017年,北京市东城区将“街巷长”延伸,设立了小巷管家,让辖区单位职工和居民认领街巷,参与管理,当时58岁的宋雅军想着,作为社区的一员,要为社区居民做点事,就报了名。

就这样,宋雅军一直干了下来,4年时光荏苒,小巷管家从龙潭街道推广到东城区全区,最终推广至北京市,小巷管家本身,也升格成“小巷管家团”。截至去年4月,东城区已经在全区17个街道和3个地区共招募小巷管家2064名,实现全区178条主要大街,1005条背街小巷全覆盖,从劝导不文明行

的土地上有常住居民79.4万人,分属177个社区。北京市东城区在社会治理方面的探索和创新之举,值得其他城市的建成区域借鉴。

为,到纠正占道停车、拆除私搭乱建,作为居民的一员,小巷管家深入参与到街巷治理和环境建设。

升级成“管家团”,用光明社区居委会副主任申晓艳的话来说,就是从过去的“单打独斗”变成“组团作战”。小巷管家在日常巡访中发现问题及时上报,居民也形成了有困难、有问题找“管家”的习惯,小巷管家已经处理事件超过37万件。

“我在东城出生,这里有古都的风韵,也有历史与现代的碰撞。”北京广播电视台《这里是北京》主编张晓达告诉《工人日报》记者。历史积淀让这里的居民更加从容自信,对城市乡愁有着自己的见解,对社区也有着更多的归属感和认同感。

“我们社区分为4个网格,楼房29栋、两个平房院,有4000多户1.1万人口,社区内有161家单位。”东花市街道东花市南里社区书记杨立新,说起了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居民们的守望相助。社区党员、在职党员、志愿者组成了晚间巡查队,利用晚上遛弯的时间询问小区内带着行李箱的人和拎包客,第一时间敲开返京人员的家门。社区里成立了7支志愿者队伍,共计300多名志愿者参与其中,很多退役老兵冲在防控第一线。

社区的志愿者们值守门岗和公共区域,并进行消杀工作,筒子楼里没有电梯,老党员和退役老兵每天上下午爬上爬下两次消杀不辞辛苦,社区青年突击队服务境内外返京居家隔离居民807户,1700多人,通过双向承诺服务温暖了群众的心,有效切断了传播危险。

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东城社工总计敲开了31万户家门,服务居家观察的8万名居民。

大家一起来协商

在前门街道草厂四条的小院议事厅负责人李彩仙看来,越来越多的居民打开了家门,不再关着门只过自家日子,而是共同参与到社区建设中来。草厂四条44号院里,挂着“小院议事厅”的牌匾,草厂社区的小院议事厅是2012年成立的,至今已有9个年头,居民在生活中产生的问题、建议、诉求都来议一议。“上传下达,把居民的意见征求上来,及时传达给社区党委,社区党委将问题上报街道,问题处理后,我们再反馈给居民。”李彩仙说。

这样的议事厅,不仅让居民有了归属感和主人翁意识,也提高了社区治理和服务的精细化水平,小到院子里的晾衣空间如何设置,大到“煤改电”,架空线入地,厕所改造,这些都是小院议事厅的协商内容。天气冷了,垃圾分类桶站面临值守难,草厂四条的小院议事厅召开了,群策群力一起想办法。大家决定进一步向居民宣传垃圾分类知识,从源头指导好如何分类,到了晚上,居民自发熬制的姜丝可乐,送到了还在值守的志愿者们手中。

“居民没有什么大事,都是鸡毛蒜皮的事儿,但这些事也得有人管,您说不是吗?”一位居民说。基层社区面对的事情不大,但往往却是居民的操心事、烦心事和揪心事,协商起来并不容易,往往涉及诸多方面。

社区的老人说,马路太宽,人行道绿灯时间太短过不去,杨立新自己掐着表试着走,“真过不去”。作为区人大代表,她建议延长人行道绿灯,但是,车行道堵车怎么办?后来,协商之下,人行道绿灯适度延长,路中间多了一个安全岛,一次走不过去,分两次走。

永定门外街道杨家园社区,一共有17栋楼,“我在这里住了10多年,以前物业也没有,产权也复杂。”老居民谈起小区的过去,安装电梯,一个楼门“恨不得有八种意见”。有的居民说,如果需要交钱我就不装,“就当爬楼梯锻炼了。”杨家园社区的对口协助单位,是区工商联,工商联请来了法律顾问,推动社区建立了4

个物管区域,之后的工作就好推进了。

引入多方资源

杨家园社区的情况并非孤例,东城区58个委办局对口协助老旧小区问题较大的58个社区,各委办局发挥各自优势,帮助各小区建立一整套物业管理机制。精治、共治、法治,实现了社区与主管部门的无缝对接。

建设好社区,需要引入多方资源,引入专业力量。无法在家中如厕,是平房区居民面临的问题,李静思是朝阳门内南小街205号院“美丽院落”改造的设计者之一,院落改造过程中针对居民的如厕需求,设计安装了一个净化槽,“净化槽可以对居民家中排出的污水进行微生物处理,排出来的水质接近中水标准。”李静思说。净化槽安装那天,小院里的居民兴高采烈像过节一样,“我们可以买马桶了。”李静思表示,这样的净化槽适用于无法进行大规模市政改造的老城区。东城区城管委负责人表示,“美丽院落”改造一原一策,在保持千年老城风貌的同时,也让居民能过上便捷的现代生活。

辖区单位的资源,也能够有效用于服务居民。和平里街道和平里三区居民王雅薇,全家开心的一件事就是有了停车的地方。作为老旧小区,和平里社区设计之初并没有预留多少停车空间,王雅薇家上有两位老人,下有两个孩子,“非常需要用车”。经过协调,她的车可以停在雍和航星科技园的停车场,离家步行只要四分钟。“头一期50个车位,每个月500元,车位不固定,但保证有地方停。”和平里社区书记王京朝说,社区内单位提供的共享车位,缓解了居民停车难。而在雍和航星科技园总经理李志伟看来,这是一件社区和企业双赢的好事,企业在尽到社会责任的同时,也盘活了存量资产。通过这样的方式,东城区全区增加了1112个共享车位。

“每一件小事,其实对居民来说都是大事。每件小事都有人张罗有人管,这就是宜居,这就是胡同里的幸福。”有居民如是说。



在北京市东城区东花市南里社区的“花缘之乐公众学堂”,社区的老人们正在学习书法,其乐融融。 本报记者 赵昂摄

G 民声

莫让你的“教育焦虑”成了别人的“智商税”

苏墨

家住北京市海淀区的笔者,几乎每天都在被各种教育培训机构的广告狂轰滥炸,“都两岁了,还没有开始学英语,您快要错过敏感期了。”“三岁再不学编程,孩子就被时代抛弃了。”既然是广告,自然要制造紧迫感,“您来,我们培养您的孩子;您不来,我们培养您孩子的竞争对手”……

尚不熟悉母语规则的小宝宝,能否系统性学习与母语全然不同的第二语言?少儿编程队还在学数数的小孩子究竟有多大效果?其实,这些问题,教育专家已经有权威回答,小孩子的认知能力是有限的,而知识的学习是需要系统性和规律性的,超越年龄拔苗助长不仅效果堪忧,有时反受其害。

说白了,有的广告,真的就是“智商税”。我原以为“久经考场”、警惕性高、辨别能力强的当代青年人,对这些广告应该能够做到“刀枪不入”。但当我加入若干“妈妈群”“闲置物品转换群”后,发现事实上,这些群归根结底都是“拼娃群”。家长们的“教育焦虑”比推销广告的话术来得还夸张——不用商家“忽悠”,就能“自投罗网”,争着抢着被“割韭菜”,交纳“智商税”。

上补课班只是“沉迷鸡娃,不能自拔”的家人们,日常花费的一个小头儿。“为了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从怀胎十月就开始购置胎教仪器,价格还很贵;生下来就开始想办法、提前交费占“坑好”的幼儿园;为了给孩子良好的学习氛围,做“当代孟母”,选小区、帮孩子筛选接触对象;最费钱的是购置天价学区房,上千万元的“老破小”,经常要靠抢才能锁定……家长疲于奔命地“自鸡”,倾其所有地“鸡娃”,到头来,真正“上岸”考入理想学校的孩子还是那个人数。

笔者曾想过一个问题,家长们不断前置“人生起跑线”的想法源头在哪里?想来想去,大概是“一代要比一代强”的这个执念作祟。的确,谁都希望自己的儿女拥有更强的能力、得到更幸福的人生。但这个想法本身就有漏洞,孩子要比自己高,后代一代比一代高,那几代以后不就成了“巨人族”?有好的愿望无可厚非,但是执着于梦想成真,就不切实际了,到头来伤了自己,更伤了孩子。

也有很多家长“鸡娃”的心态据自己说很“佛系”——花钱买心安,孩子以后别埋怨,自己也不后悔;还有家长声称“三观皆正”——我自己努力,以身作则,有了快乐童年就没有幸福人生。于是,在这种彼此“激励”、互相“鼓励”下,“教育焦虑”成了社会流行病。还是举补课这个小例子,谈起课外辅导,走过来的人都认为作用不大;还在经历的人深感乱象丛生、不堪重负;即便是局外之人,也不胜其烦,希望能加大力度清理整顿。但事实上,大家交起这份“智商税”时,依然争先恐后,唯恐自己交晚了、交少了,耽误了孩子。

今年全国两会上,全国政协委员、江苏省锡山高级中学校长唐江澎谈道:“好的教育应该是培养终生运动者、责任担当者、问题解决者和优雅生活者,给孩子们健全而优秀的人格,赢得未来的幸福,造福国家社会。今天孩子的全面素质就是国家未来的整体实力,也是我们社会的幸福程度。”在他看来,补课班增多了,只能破坏孩子的兴趣,没了兴趣又何谈学习?这番话网上引起了热议。

好的教育应该是会让学生变成更好的自己。社会需要的不只是优秀的学生,更需要优秀的人。在日益多元的社会,一个人的能力远不是分数、证书可以量化的。如果我们只是将升学作为评判标准,那么我们传递给孩子不只是难以自拔的焦虑,也让他们失去了本来的更多可能。换句话说,你今天交过的“智商税”,难道还要让孩子们长大后再交一次吗?

不过,说到底,家长们如此焦虑,是因为优质教育资源有限,以及不同区域教育发展不均衡。从根上解决问题,光我在这儿劝没用,还是要从源头入手,从教育资源的供给侧入手。

贵州清镇提升人才工作质量

本报讯 今年以来,贵州清镇市在全市范围内推行人才“四化”理念转化实践,促进人才工作动起来、统起来、干起来,以人才工作高质量不断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该市紧盯人才“引进、培育、使用和服务”重要环节,切实解决人才“引不进、培不好、留不住”的问题。坚持“系统化推进”,把摸清人才资源底数、人才发展目标、制定人才政策等工作实行项目化、清单化管理推进,实现人才底数、目标、制策无缝对接落实,全链条、全视角、全方位提升人才质量。(姜敬)

安徽肥西经开区民生建设提速

本报讯 2021年,安徽肥西经开区将快马加鞭推进众多大建设项目,民生工程建设迎来大提速,大建设项目共48项,当年预计投资20亿元。

据悉,这些项目包括交通基础设施、生态环境综合整治、园林绿化、公用事业、安置房建设等工程项目,涵盖交通出行、民生服务、教育医疗、环境保护等诸多方面等,将为当地民生发展提供有力保障。正在扫尾的新港南区安置点B区工程为例,可提供住宅2885套,配建了一所36班容量的小学和一所12班容量的幼儿园,方便就近入学。(方杰 朱镇)

一对务工夫妇的“幸福转身”

杨胜华(右)、林丽娟在大棚里给辣椒苗吊索(3月16日摄)。

杨胜华和林丽娟夫妇是贵州省榕江县贵阳·榕江联建高标准蔬菜保供园区的农业技术员。两人因在广东打工结缘、相恋、结婚。看到农村广阔的发展前景,夫妻俩于2016年返回家乡,从事农业生产。

2019年以来,榕江县流转车江坝区的土地,通过“龙头企业+合作社+农户”的运营模式,建起高标准蔬菜基地。杨胜华和林丽娟应聘到蔬菜保供园区一家农投公司从事现代农业管理与种植,负责大棚蔬菜的管护、病虫害防治及工人管理工作,农业种植、管理等技能不断提升,实现了从打工者到职业农民的转变。

大学学习行政管理的杨胜华说:“搞农业是门大学问,一点都怠慢不得,要像照顾自家孩子一样认真负责”。

目前,夫妻俩工作在一起,收入稳定,下班后能照顾家庭,他们感到很知足。谈到未来,夫妻俩信心满满。

新华社记者 杨文斌 摄



互联网信息服务终端软件捆绑其他软件现象多发,此类行为缺乏法律规范

软件“捆绑安装”,到底行不行?

本报记者 杨召奎

上海消费者李强(化名)下载某杀毒软件之后,发现电脑里竟然有“软件管家”“护眼大师”两款软件。李强认为,自己并没有下载这两款软件,这属于杀毒软件“捆绑安装”的软件。于是,他诉至法院,要求杀毒软件运营公司停止侵权并赔偿损失。这是全国首例由消费者针对软件“捆绑安装”发起的侵权之诉。

最终,法院认定杀毒软件运营公司“捆绑安装”其他软件,侵犯了李强的自主选择权,并要求其赔偿损失700元。

3月15日,该案例入选中国消费者协会2019~2020年“全国消费维权十大典型司法案例”。

中消协专家委员会专家指出,经营者提供软件捆绑下载及安装服务时,如未尽到以合理方式事先提示和告知义务,未赋予消费者选择单独下载的权利和独立卸载的功能的,则构成对消费者自主选择权的侵害,依法应承担侵权责任。

是内置功能模块还是独立软件

2018年底,李强下载某杀毒软件后发现,其电脑桌面发现有“软件管家”快捷方式,另在“软件管家”中发现“护眼大师”软件。于是,李强向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在一审庭审中,法庭主持当庭勘验,发现该杀毒软件下载完成后,桌面确实会自动生成“软件管家”快捷方式。杀毒软件主界面显示模块包括“软件管家”,点击后则弹出独立于原界面的独立界面,包含软件搜索、下载、升级、清理、卸载等功能。该杀毒软件中的“护眼模式”默认打开,点击该按键后弹出独立界面,包含“过滤蓝光”及“定时休息”两个功能。另点击该杀毒软件官网,有“护眼大师”等独立下载链接,未见“软件管家”下载链接。

不过,杀毒软件运营公司辩称,“护眼模式”和“软件管家”均是杀毒软件的内置功能模块,并非捆绑软件,功能设置系为了方便用户更好地体验杀毒软件产品,且杀毒软件卸载后,“护眼模式”和“软件管家”也会同时卸载,不会留在用户电脑里。

对此,法院审理认为,无论是从外观表

现,还是产品实质功能来看,结合相应技术标准,“护眼模式”及“软件管家”均具备作为终端软件的独立性,而非杀毒软件的必要组成部分。因此,在该产品中内置“护眼模式”及“软件管家”功能构成“捆绑安装”软件行为。

此外,消费者在选择下载杀毒软件时,必须同步下载及安装“护眼模式”及“软件管家”,杀毒软件运营公司并未向消费者提供“仅使用反病毒软件”的选项,亦未事先以合理方式进告知及提示,因此侵犯了消费者的自主选择权。

去年5月,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做出一审判决,要求杀毒软件运营公司赔付李强500元。一审判决后,杀毒软件运营公司提起上诉。不过,上诉期间,原被告双方在二审中达成调解协议。此后,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做出二审判决,要求杀毒软件运营公司赔付李强700元。

强制捆绑违法,消费者可依法维权

中消协专家委员会专家指出,当前,互联网信息服务终端软件捆绑其他软件的现象多发,但对此类行为的合法性,目前的法律法规

层面缺乏判断标准。司法实务中,对捆绑软件行为性质、法律后果作出认定的案例,尤其是以侵害消费者权益为裁判依据的案例,处于空白状态。

“应当看到,不同软件产品的组合下载和安装,不仅有利于优化消费者的使用体验,还能促进软件运营商、甚至是互联网行业的整体发展。但也应看到,软件提供者如果未就捆绑软件尽到显著的提示和告知义务,未赋予消费者选择下载的权利和独立卸载的功能,则违背了消费者的真实意愿。”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法官周泉泉说。

在周泉泉看来,强制捆绑软件,不仅侵害了消费者知情权和自主选择权,还会发生擅自获取、泄露消费者个人信息、篡改消费者电脑系统程序或文件等严重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情形。

“如果经营者在提供软件下载服务过程中采用了强制捆绑的方式,则构成对消费者法定权利即知情权及自主选择权的侵害,消费者可据此寻求法律救济,要求经营者依法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周泉泉说。